

雪竈寺志兩種

李一氓



宣寧府志 兩卷



寶出窠頭寺志

兩 鐘

李一氓



宋張栻撰的乾道八年所撰《寶出窠頭寺志》卷三「寺化都分鎮區間」云：「寶出窠頭寺，在寶出窠頭山，山在寶出窠頭山，山在寶出窠頭山……」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六月

出版

序

李一氓

雪竇作爲浙東山水而有名，大概開始於東晉。因爲南渡的洛陽士大夫的足跡，已經到湖州、紹興、寧波了。唐宋以後，佛教依靠雪竇山大有發展。富有風景的峰嶺巖洞等相繼開發，橋路亭閣也相繼建築，加上和普陀、天台相臨近，交通方便，除了善男信女外，當然也就吸引了不少遊山玩水的旅遊者。

至於山水的記錄，明李濂《遊雪竇山記》稱「余少閱宋大觀《四明圖經》，慕雪竇之勝」；但宋張津撰的乾道《四明圖經》（咸豐煙嶼樓刻本）卷三，奉化部份極爲簡略，既未涉及雪竇山，也未涉及雪竇寺，僅卷十一有呂夏卿的《雪竇山資聖寺明覺大師碑》。黃鼎序乾道《四明圖經》時涉及大觀《圖經》內容，「人物古跡，釋氏道流，下而至於山林江湖……靡不畢備」。但他自己

却没有這樣的內容，是很可怪的。

楊爾曾的《海內奇觀》（萬曆本）卷五，《兩越名山圖說》已著錄了雪竇的山石林壑。《三才圖會》（萬曆本）地理卷九，對雪竇山有同樣的文字記載。何鏜的《名山勝概記》（崇禎本）卷十八，浙江六，有楊守陳的成化時《遊雪竇山記》和李濂的嘉靖時《遊雪竇山記》，各自記錄了他們遊雪竇寺的情景。可是徐霞客好像沒有到過雪竇山，只有《遊天台山日記》、《遊雁蕩山日記》、《遊雁蕩山後記》和《浙遊日記》。而《浙遊日記》寫的却是昌化、於潛、金華、蘭溪。《奉化縣志》我沒有去查明本和順治、康熙、乾隆各本，只查了光緒刊本，第四卷山川上有一段關於雪竇山的敘述。後附有關雪竇山遊記，作者大半是宋元人，如曾鞏、王安石、戴表元、黃潛等。

大的廟宇，大概都佔據一個極好的風景位置。以雪竇而論，雪竇山範圍小，雪竇寺規模大，因此山和寺這兩者也混在一起了。雪竇寺是一個禪宗的廟宇。寺初建時，以唐為準，名瀑布觀音禪院，宋代咸平間改名資聖禪寺。紹興中燬，隆興間重建。元至元中復燬，復重建。明崇禎末再燬，清順治間再重建。寺額雖然還是用的宋朝的題名，但明朝以後，普遍都叫做雪竇

寺了。

唐代天祐時，有一個常通禪師在這裏建廟說法，遂相傳爲雪竇的開山祖師。宋代有名的明覺顯禪師，他當雪竇住持最久，有三十一年。《五燈會元》之一燈，《建中靖國續燈錄》，宋釋惟白撰。這惟白就是雲門宗雪竇重顯法派的法雲、法秀的弟子。

根據《五燈會元》，唐宋間住持過雪竇寺法務的就有常通禪師（卷四），雅禪師及其法嗣普印（卷十二），嗣宗禪師（卷十四），重顯禪師及其法嗣義懷、省倬、有蘭、守明、傳宗、日慎、法宗、蘊觀、顯昇、惠金、曾會（卷十五），道榮禪師及其法嗣大智，明禪師及其法嗣法寧（均見卷十六）。

雪竇寺住持的禪宗宗派，據《雪竇寺志》卷四下，法眼宗有五人，雲門宗有九人，曹洞宗有八人，臨濟宗有十九人。所以臨濟宗住持的時間當爲最久，而且香火極盛。

《雪竇寺志》大約只有兩部。

第一是弘光時《雪竇寺志略》，內容極爲簡薄，全書僅三十九葉。它的好處在於它是弘光

本，明代書籍的弘光本很少，所以從版本上看是很可貴的。書首附有雪竇山通景的版畫八幅，畫刻均佳。畫後題「弘光乙酉春日陸介祉寫並識」。按《續甬上耆舊集》載：「陸介祉，字純嘏，鄞縣人，前諸生，國變後，棄之。喜畫老松古柏，以見寄寓。」據牧雲的序，這冊《志略》爲履平所輯。惟此序轉載於《雪竇寺志》時，却改作行正所輯，不知何故。又寺已在崇禎時焚燬，可這個弘光的《志略》却一字不提。僅牧雲的序：「石奇和尚自天台景星巖，赴諸護法之請，煨燼之餘，茅堂竹戶，學侶雲臻，瓦礫土堆，宴處自若。」顯然是廟宇還沒重建時候的情況。一九四八年鄭振鐸輯《玄覽堂叢書》，把此《志略》列入三集第二十八冊，縮小覆印，惟闕最後一葉。

第二是《雪竇寺志》。兩個編輯人，一是山夫行正，一是道嚴行恂，是石奇十二個門徒的字輩的兩人。行正，暫無可考，會作點詩，《雪竇寺志》後部藝文就收了他自己的詩若干首。至於行恂，爲餘姚張廷賓，字客卿，天啓四年舉人，甲申後出家，入雪竇寺充石奇的記室，傳「東南高蹈之士多歸之」，年八十八。光緒《餘姚縣志》有傳（列傳十四）。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三有關張廷賓的敘述，與《縣志》同。

寺志體例，大體上仿自天童。行幟的序上就說其體式「略仿《太白山志》」（即《天童寺志》）。這是因爲寺住持石奇和輯者行正、行恂都是來自天童寺的。特別是行恂，早在崇禎五年，已以名舉人的資格，用本名張廷賓，和釋通布共修《天童寺志》。所以兩志體例相仿是很自然的。我又查了天啓《延慶寺志》，康熙《靈隱寺志》，其體例都差不多。寺志的主要內容在講住持的宗派師承和記錄那些和尚上堂講法的語錄，天童、雪竇兩志稱「法要」，靈隱稱「法語」。《雪竇寺志》卷五所錄唐宋禪師的法要，大體均見於《五燈會元》，但文字有繁簡。同時把一個和尚，分成祖系和法要兩個部份，還不如《五燈會元》合在一起好。志前山圖取自《雪竇寺志略》，不過把「弘光」兩字挖掉了。

至於編輯時間，涉及順治、康熙兩朝。志前的行幟的序，已注明寫於己亥，即順治十六年。道忞也有一序，未著年月，但他本人示寂於康熙甲寅（十三年），寫序時間必在十三年以前。而行恂的跋則寫於丙申，即順治十三年，自稱「志成」。卷六上却有石奇的塔銘，寫明「皇清康熙歲在癸卯（二年）春正雪竇石奇和尚示寂」及「丙午（五年）春二月……」等語。因此本書首先避

順治和康熙的諱，如玄燁的「玄」字，妙高台有的作「妙」字，有的改「妙」字；有的「玄」作「玄」，有的改作「元」。但書中遇到雍正的名字胤禛，乾隆的名字弘歷，也有避諱。如「胤」作「胤」；「弘」作「弘」或徑改「宏」；「弘光」作「弘光」，也作「宏光」，山圖就挖掉了「弘光」兩字。可以肯定志成於順治末期，但又增補了康熙的內容。自雍正到乾隆時期，則內容沒有甚麼改動，只是乾隆印書時，自不得不改去那些應該避諱的字。因此這部書的版本，應定為康熙輯，乾隆印。以後幾個後印本大體均屬重印或翻印。至於黃端伯手寫序，我懷疑那是專為《志略》寫的，以後《雪竇寺志》不過借用罷了。我確實看到過一個後印本，把黃的圖章「海岸道人」改為「忠孝節義」。

這個寺志的成書時間，正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大變動時期。首先是滿族進入中原，形成滿漢民族的尖銳矛盾。南方的明朝的官僚和地主知識分子組成反清的力量，具體是弘光政權在南京的成立和覆亡，魯王在浙東稱監國，唐王在福州稱帝，號隆武。但也由是而引起閩越的紛爭，破壞了內部團結。同時義兵蜂起，涉及江蘇、浙江、安徽各省，浙東則有熊汝霖、孫嘉績兩

部。後來浙江紹興、寧波、台州，相繼爲清兵略定。魯王南退到福建，又輾轉改踰舟山。清兵爲了打福建，從浙江調走，形成一個軍事空隙。於是浙江的反清分子，再次舉事。四明大蘭山就有王翊，上虞東山就有李長祥，平岡就有張煌言，並支援舟山。清兵從福建又回師浙江，分路進討四明諸寨，並乘大霧渡海，佔有舟山。張煌言等共奉魯王浮海至廈門。這都是順治元年到八年的事。這種多次反覆的政治、軍事局面，使得雪竇的住持人物，雖然傾向反清復明，但也二心不定。行浩所寫的《雪竇山重復資聖禪寺並寺田記》（寺志卷九上）就反映了這個情況。雪竇寺曾發生法產之爭，這個產權最後好像還是得到魯王的批准才定下來的。

但由於歷史的發展，清朝的統治在全國鞏固下來了。順治並且把道忞封爲國師，一些高級地主知識分子都跑到北京去了。經過挖改後的《雪竇寺志》，十卷後居然補刊上康熙時大官僚葉方藹、徐元文、繆彤、韓荃、徐乾學等對雪竇寺住持的祝壽詩。這時，那些畫畫的陸介祉，當過明朝舉人的行恂，也就沒有甚麼辦法了。

這或許就是《雪竇寺志》屬稿得早（順治）而印得晚（乾隆）的基本原因。今將弘光、康熙兩本加以覆印，名爲《雪竇寺志兩種》，特爲序。

一九八七年三月

雷震寺志序

聳人天龍鬼之聽此豈山靈所願哉昔

不虛行若無悲誓弘法以慰佛祖之心

新為晴李力藏胆苟非其人道

本景

書

雪實

略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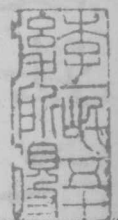
據成都李氏藏明

弘光刊本景印原

書版匡高二一七

毫米寬一五二毫米

略志序



雪竇古法窟也祖燈之綿衍山水之竒
峻海內行脚高士靡不習知之無待乎
覽諸志也然地亦以人靈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若無悲誓弘法以慰佛祖之心
聳人天龍鬼之聽此豈山靈所願哉昔

卷一
紫栢尊者嘗游四明作詩云明州三佛
地海濶魚龍腥天童與雪竇法鼓久不
鳴觀其感慨為何如蓋雪竇自唐常通
禪師開法至元無印證禪師之後無說
法住持矣今同門

石竒和尚自天台景星巖赴諸護法之

請煨燼之餘茅堂竹戶學侶雲臻瓦礫
土堆宴處自若山若頓開生面至宰官
登臨願為外護敢請說法則知所重在
此而不在彼也侍寮履平因山志放失
慮從上古錐出世為人一段奇特因緣
亦隨寢沒無以表重茲山乃稍輯其曾